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25

THE FIFTY-YEAR WOUND

五十年伤痕 下

美国的冷战历史观与世界

〔美〕 德瑞克·李波厄特 著 郭学堂 潘忠岐 孙小林 译
郭学堂 倪世雄 审校



上海三联书店



五十年伤痕 下

美国的冷战历史观与世界

〔美〕德瑞克·李波厄特 著 郭学堂 潘忠岐 孙小林 译
郭学堂 倪世雄 审校

THE FIFTY-YEAR WOUND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十年伤痕:美国的冷战历史观与世界/[美]德瑞克·李波厄特著;郭学堂,潘忠岐,孙小林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6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陈恒,黄韬主编)
ISBN 978-7-5426-2753-7

I. 五… II. ①德…②郭…③潘…④孙… III. 国际关系—研究—美国—现代 IV. E7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1150 号

五十年伤痕:美国的冷战历史观与世界

著 者/[美]德瑞克·李波厄特
译 者/郭学堂 潘忠岐 孙小林
审 校/郭学堂 倪世雄

责任编辑/王秦伟
装帧设计/鲁继德
监 制/李 敏
责任校对/张大伟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

版 次/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640×970 1/16
字 数/870 千字
印 张/59.5

ISBN 978-7-5426-2753-7/K·124

定价:98.00 元

目 录

1 中文版序言(一)

1 中文版序言(二)

1 导言

11 第一章 1945年：峰顶浪尖

第一部分

33 第二章 回到未来(1946—1950)

109 第三章 习惯成自然(1950—1953)

179 第四章 绝非如此简单(1953—1956)

248 第五章 适应漫漫旅程(1956—1961)

第二部分

323 第六章 责任与荣誉(1961—1963)

404 第七章 重任在肩(1964—1969)

477 第八章 战争阴霾(1969—1975)

559 第九章 波谷(1975—1981)

第三部分

617 第十章 重创(1981—1985)

675 第十一章 分崩离析(1985—1989)

743 第十二章 意外结局(1989—)

804 结论

816 鸣谢

818 参考文献

842 索引

920 译后记

第八章 战争阴霾(1969—1975)

377

这些年仿佛有庞大的黑牛在践踏世界……

而我被它们滚滚的铁蹄给毁灭了。

——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

1968年,美国的经济地位值得骄傲:工业生产占世界总量的34%,华尔街股市处于顶峰,道指已接近1000点。12年后,由于通货膨胀而出现调整,道指跌至300点——这是对美国经济前景真正丧失信心的标尺。太空竞赛也存在相似的情况。10年前,美国最前沿的科学家之一李·德·福雷斯特(Lee De Forest)曾说:“人永远也无法到达月球。”1969年美国“老鹰”登月了。但是,到了1975年,他的态度是“那又怎么样?”这就是人们对美国失望的极好说明。

在70年代,美国人在态度上比200年前更像欧洲人,明显表现在对公众领导层信心的丧失、对科学发展可能给个人带来威胁的忧虑、对海外卷入的怀疑,这些现象要求美国走向孤立和封闭。大约到1969年年底的时候,人们已不再普遍认为,消费奇迹或技术突破会给所有人带来好处,或者到达比月球更远的地方去会扩展美国的精神,因为所付出的代价远远超出了任何回报。没有人指望会从海外传来好消息,尤其让美国人感到震惊的是,美国在经济上遭到的挑战来自横滨,而不是鲁尔,这个震惊与其说是种族上的,不如说是文化上的。

378

这个国家很快就遭到了和平时期通货膨胀的打击,伴随着史无

前例的高失业率。冷战是原因之一,不仅因为二十多年来美国一直在损失金钱和人才,而且同时还因为美国在亚洲从事战争。如果60年代持续增长的经济没有被无情地打断的话,那么今天的美国会有多大的不同啊!减轻负担的很多尝试当时很快就出现了,武器购买在1970—1975财政年度中下降了三分之一,全部的国防开支在这个十年中按实际价格计算减少了将近20%。但是,五角大楼的预算仍保持在3000亿美元左右(按今天的美元价格计算),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尽管伸手要钱的情况减少了,但以变相补助、激励,或者权力回报的形式还是不断出现。

在美国人能够到达星际世界的时候,他们还听到自己的领导人正在欢呼在“均势”方面所取得的新的伟大成就,“均势”概念来自博尔吉亚家族(the Borgias)时代。^①这一均势不仅包括与苏联和中国之间实现的某种所谓的“平衡”,而且还包括涉及西欧和日本在内的精巧的“五角均势”。作为世界上的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的地位已经足够稳固了,这似乎成了未来世界的一个事实。任何回顾肯尼迪总统有关苏联和中国言论的人都可能会遇到讥讽,就像贝里·格特华德的话“为什么不要胜利?”一样,从危言耸听的沙文主义变成了滑稽可笑的奇谈怪论。

美国人正在忍受着低迷的工业民主、莫斯科的挑战,最严重的还是来自河内。他们还在1968年眼睁睁地看着北朝鲜在国际水域抓走了一艘间谍船——美国海军的“普韦布洛号”(USS Pueblo),一人在事件中死亡,82名船员被拘押和拷打长达十一个月时间。^②1969年北朝鲜还击落了一架在90海里外的公海上飞行

① 博尔吉亚家族是定居在意大利的西班牙世袭贵族,在15—16世纪出过两位教皇和许多政治及宗教领袖。文艺复兴运动就是在这个家族的血腥统治下的30年中诞生的。

② “普韦布洛号”是一艘原属美国海军的间谍船。1968年1月11日,“普韦布洛号”从日本佐世保港出发,到达朝鲜清津外海,进行情报搜集作业。1月22日,“普韦布洛号”驶往元山外海活动,距离海岸约12海里。由于性能不良,当“普韦布洛号”遭朝鲜方面船只追击时,该船虽曾试图逃离却因速度不足(转下页)

的没有武装的美国通讯飞机(大白天,不可能认错了身份),31名机组人员全部死亡,朝鲜同样没有遭到任何惩罚。1976年北朝鲜人在“三八线”的非军事区砍死了2名美国军官。所有这些,美国人都忍下了。同时,那些索墨查的人(Somozas)、马科斯的人(Marcoses)、蒙博托的人(Mobutus),还有巴列维(Pahlavis)的人也不断向美国伸手。他们要的东西本身并不都非常昂贵,但豢养这样的人却是令人沮丧的事,最终也是危险的事。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在1972年民主党大会上所作的呼吁:“回家吧,美国”,并不仅仅只有新孤立主义者表示欢迎。

379

这些年来,从登月开始,到南越垮台结束,有些人一开始还觉得很多东西似乎还都可能的,但结束时的失望比1947—1968年间还要大得多,让他们损失惨重。本章首先将考察美国政府如何减少肯尼迪时代那种没有界限的承诺,以及如何对莫斯科和北京采取新的策略行动。第二,揭示理查德·尼克松实行的美苏关系缓和政策为什么被误导,实际上它加剧而不是减轻了双边的紧张关系。第三,讨论冷战如何在财政和贸易方面在这些年使美国进入了动荡时期。第四,解释为什么越南战争结束对美国的伤害比1968年战争高潮时期所能想象的还要更深。最后,我们要关注逐一被赋予“国家安全”内容的秘密行动,它们到1975年都被公之于众,我们还要关注美国人的生活所受到的影响。

布莱斯·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警告说:“所有人类罪恶都来

(接上页)而被包围,并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遭到逮捕。由于在事件中“普韦布洛号”曾不听从对方的命令在海面上突然停下而遭到朝鲜方面以武器扫射,造成船长以及几名船员被击伤,一名船员死亡。经过外交谈判,1968年12月,美国接受朝鲜提出的要求,承认错误、道歉、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作为朝鲜方面将人质释放的交换条件,但朝鲜仍宣布没收该船。82名被俘船员以及死亡船员的遗体在板门店移交给美方,船长和副船长回国后曾因没进行任何抵抗就放弃了船只而被送军事法庭起诉,最后未作判决。迄今为止该船仍然由朝鲜方面保管,1998年“普韦布洛号”被拖到西海岸,停放在平壤的大同江畔,作为博物馆用途而成为当地非常受观光客欢迎的名胜。

自……不能安分守己的人。”^①冷战制造了很多不能在任何一个地方安静生活的人。像约翰·肯尼迪一样，尼克松乐于将自己置身于紧急情况之中（这不能用来指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此人在1968年被肯尼迪以微弱优势击败）。尼克松和肯尼迪都是想要做点什么事情的人，而且不像约翰逊，他们迫不及待地要在海外做点什么。事情越是极端，味道就越足。像肯尼迪一样，尼克松的总统职位是他展示不安定勃勃雄心的中介。像肯尼迪一样，尼克松的海外成就在当时看来是值得的，但证明的时间太短暂了；也像肯尼迪一样，尼克松总统的短促任期是冷战框架决定的：古巴密探、维护总统对“国家安全”的权力以及对秘密机构的秘密处理。如果一个人从这些事件中抽出任何一个进行回顾的话，那么他肯定会发现一个由漫长和无意的冲突所带来的漫长和无意的后果。

380 尼克松是20世纪第一位上台时其所属政党在国会两院中都不占多数的美国总统。他上台依靠的是自信和希望的“强力梦想”（driving dream）——尼克松自己的术语。二战以来每一位总统都是如此，只有杜鲁门可能是个例外。但是，尼克松的梦想因为他援引斯蒂芬·贝尼特（Stephen Vincent Benet）的一句话而蒙了一层阴影，这句话就是“夜晚倾听火车的年轻人”，描写的是一幅孤胆雄心的画面。尼克松出生在一个保守的家庭，接着他通过个人奋斗得到了政治权力所具有的高度敏感的文化，这种文化在冷战中已经被无情地正轨化。他在担任总统前写的书——《六场危机》（*Six Crises*）和当选之后写的书——《真正的战争和舞台上》（*The Real War and In the Arena*）都记录了这种狂热的冲动。在第一本书中，他经常把自己描写得惊慌失措，这是极不寻常的事情。想象一下乔治·马歇尔、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或者约翰·杜勒斯是否会让他

① 布莱斯·帕斯卡尔（1623—1662），法国人。他是一位早慧的神童和早夭的天才。他的主要数学成就是帕斯卡尔定理，他也是几率论的奠基者之一，不过，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宗教性著作《沉思录》。

自己手下告诉苏联人,他们手上抓到一个可疑的疯子,这不可能,但尼克松却有一次指示手下人为获得谈判优势而这样做。他在驱除自己头脑的魔鬼,而冷战为他提供了一个发泄的公共渠道。在50年代曾有一部科幻小说断定,在21世纪末期共和党人会提名“一个失常的人去管理一个失常的世界”,而尼克松已经提前来到了。

在他执政的整个过程中,尼克松满脑子都是国际舞台上的大事。他肯定,为了这个舞台,美国真的需要一个总统。在等待就职典礼期间,他任命了另外一个聪明的人,此人在国家权力层面上总是悲剧性地解读所有的大变革——社会变革、人口变革、技术变革。尼克松后来得出结论认为,亨利·基辛格属于煽动危机、“吸引别人注意自己”的那种人,他还补充说,如果越战不存在的话,那么基辛格会在世界上的其他某个地方,比如厄瓜多尔(Ecuador)搞一场危机出来。¹培育这种职业生涯的国家要为可厌的意外事件和昂贵的弥补措施做好准备。

在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之间那场令人胆寒的冲突(现在大部分人都认为那是“危机年代”)发生不到10年,这样的戏剧性事件就已经成了拙劣模仿的对象。1971年,伍笛·艾伦(Woody Allen)在一部简短的影片中抓住了这一时刻,影片的名字叫《制造危机的人》(*Men of Crisis*),该片讽刺性地描写了一个妄自尊大的“权势人物”在战胜自己酿成的紧急事件之后举行庆祝的情况。这个电影滑稽可笑,但是,这种行为所造成的代价越来越大,即政府和美国精英脱离了美国大众,而美国大众的生命可能掌握在政府和精英的手里。尼克松认为,“人民需要被束缚在国家大事中,这样他们就会忘记自己的存在多么单调”。²他提出,这种充满智慧的年代就是记忆芯片出现后的年代,那时的记者们打造了一个术语“硅谷”(Silicon Valley)。这就是肯尼迪时代的基本设想:对于一个人民忙于琐事的国家来说,制造公共紧张情绪将是唯一有价值的挑战。实际上,这对任何民主国家来说都是一种奇谈怪论,更不用说美国了。

381

在就职一个月之后，尼克松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作为欧洲五国之行的一部分，他在巴黎会见了戴高乐。³ 仅仅在办公室呆了四个月，他又忙于海外之行了，这次是环球旅行，第一站是关岛，在那里，他与敏感的记者分享他的即席发言。在尼克松自己所称的“尼克松主义”中，他认为，美国人将不再“制定所有计划，设计所有项目，执行所有决策，承担世界自由国家的所有防御。”⁴ 那种已经与越战背景相抵触的东西不是缩减开支，而是尝试某种界限的回归，冷战政策最初就是在反对这种界限的基础上形成的。

在经过几次认真推敲后，尼克松主义反映出美国对盟国的繁荣越来越有感觉，它也突然发现对美国的持久意志的怀疑态度。就像杜鲁门主义一样，尼克松主义假定，其他国家需要在自卫方面发挥主要作用，同时，尼克松主义也是含糊其词和相互矛盾的。不论叫什么名字，尼克松主义甚至在其作者离职之后还在指导美国的政策。

尼克松在他的第一个年度“世情咨文”(State of World)报告(该报告由基辛格完成，对应的是宪法要求的国情咨文)中宣布，在决定防御需要方面，他将执行更严格的标准。这个国家将不再尝试为维持“两个半战争”的能力而建造军舰、喷气战机和战斗师，“两个半战争”的构想是肯尼迪和约翰逊的理论家们提出来的，意思是指美国人可以同时打两场半战争，一场是在欧洲打三个月的非核战争，一场是与中国打一场因袭击韩国或南亚而引起的全面战争，半场是在世界其他地方——比如说在越南——打一场理论上的“小”冲突。现在美国人只是要准备去打这“两场半战争”。⁵

由于美国人对“史无前例的(如果不是特指的)紧急情况”重新产生了吸引力，因此就必须加强对外军事援助以弥补差距。颂歌再次唱了起来：盟国出人，美国出高技术武器和支持。⁶ 这是一个在创建时就遭到北约蔑视的变异概念，而且它对亚洲附属国没有多少

382 吸引力，尼克松主义最初不得不强加到这些国家的头上。从美国最亲近的盟国那里获得甚至适度的合作常常都很困难了，例如，1968年有114艘英国商船在海防港停靠，第二年只有74艘偷偷去

做对美国有帮助的贸易。

提升盟国的自卫能力还有其他原因,包括比如对维持美国收支平衡有好处。1970年,美国向世界出售了价值9.52亿美元的武器。8年之后,这个数字就票面价格而言就增加了十倍以上,但在这个10年结束时仍然落后于苏联和法国的累计销售额。美国扩大军售市场份额的结果是讽刺性的,例如,当两个北约盟国于1974年彼此开战时,土耳其的一架由美国供应的轰炸机击沉了一艘自己的巡洋舰,这架飞机把它错当成了希腊海军从美国购买的同一型号的军舰了。

华盛顿再次发现,花费更多的金钱和物资并不容易避免直接卷入战争。不论在韩国还是在伊朗,政治赎金实质上最终付给的是很难讨价还价的附属国,它们要求美国提供的是大礼物、先进武器以及甚至更多的明确的美国承诺,以此考虑它们的忠实性。例如,1970年为了从韩国撤回只有一个师,美国答应在那里永久驻扎一个美国战斗轰炸机联队,并提供10亿美元的特别拨款帮助韩国部队实现现代化,这才让首尔感到舒服,除此之外,韩国也已经开始接受7亿美元的常规军事援助。在伊朗,大约2.5万美国部队很快卷入,帮助伊朗国王巴列维照管新的美式武库。以色列不可能被忘记,尼克松于1970年同意特拉维夫提出的一张长长的武器购买清单,此前,美国为了抑制中东的军备竞赛曾拒绝了这个清单。⁷

现在美国回头要加大对那些据称拥有共同利益的国家的依靠,已经晚了。至于核战争危险,它似乎最可能发生在两个共产主义巨人之间。1969年,严重的边境摩擦使莫斯科考虑要自行其是,发动一场对中国的核袭击。据当时最早一批的一位中国学生回忆说,北京开始确信,“克里姆林宫的那些傲慢的危险人物准备什么都豁出去了”。⁸或许,不许任何国家离开社会主义阵营的勃列日涅夫主义,也适用于中国。中国领导人有足够的理由预期苏联的进攻。他们正好自己也有足够的核武器来威胁刚刚支持过他们的人。

有人说美国在越南的行动是为了遏制中国的野心,这种理由越

来越牵强,尼克松上台终结了这种论调。不论谁当总统,尝试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恢复邦交关系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欧洲和美国的很多人包括新到华盛顿上任的人,似乎并不认为中国向西方的建议代表了对苏联恶意的最佳判断。1971年1月穿越西伯利亚的游客遇到的士兵都希望结成反对中国的阵线。阿穆尔河(Amur River)上的哈巴罗夫斯克城(Khabarovsk)时常会没面包吃,人们振作精神对抗围困和饥荒。⁹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没有一个美国官员,从根本上说没有一个美国普通公民,曾经进入中国。那年7月,基辛格秘密到达北京(经过巴基斯坦偷偷进入,巴基斯坦扮演了中介人的角色)为总统争取到了渴望已久的访问邀请。白宫绕过国务院和国防部进行秘密渠道的沟通,已经成为这届政府的第二个特点。所有围绕中国倡议的思考对于介入的人来说都是有趣的,但却是没有理由的。公众会被告知,秘密是至关重要的,这样,右翼批评家就不会破坏这种大胆的外交。当然,如果尼克松不是总统的话,主要的右翼批评家应该是尼克松。他一接到邀请信,就在一个晚间电视讲话中向全国人们摆起了那个出名的姿势。之后,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罗纳德·里根被派到台湾去做解释工作。

《纽约客》杂志搞了一幅漫画,一个面目难看的人戴着一顶皮帽子在克里姆林宫墙上潦草地写着“解开蒋介石身上的枷锁”。世界走了一个完美的圆圈:被美国现在弃置一旁的恰恰是蒋介石,而北京在美国人眼中再次成为真实的存在。台湾在那年早些时候被逐出联合国,前景甚至变得更加黯淡了。次年2月,尼克松的“对中国开放”行动远比不上传统格言的喝彩声——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这是“一位创造性的全球战略家”的杰作,《上海公报》(*Shanghai Communique*)(它把台湾问题推给不明的将来,寻求遏制苏联“霸权”,向发展正常关系迈进)是“美国历史上最精致的(协定)之一”。¹⁰然而,在两个主要敌人中选择加强较弱一方的力量很

384 难说是什么杰作,而且也没有回应可以能够被北京和台北同时接受的主张。承认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设计早在约

翰·杜勒斯准备的立场文件中就有了。

至于尼克松和基辛格亲自参加协商的公报,至少在交给马歇尔·格林之前,存在着一个根本漏洞,格林那时已经是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尽管被排除在白宫的谈判小组之外,格林还是对漏洞提出了猛烈批评:所有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签署的安全条约和承诺在最后的文件中都得到了重申,唯一缺少的就是1955年与台湾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Mutual Defense Treaty*),该条约是由艾森豪威尔签署,并经参议院批准的。毫不奇怪的是,中国人坚持认为,美国代表团即使要改变这种因自我疏忽造成的政治性灾难性已经太晚了。在美国的恳求下,他们至少同意有关华盛顿在亚洲的条约承诺这部分整个去掉。接着,公报文本就发表了。

尼克松和基辛格在中国问题上的表现,其代价是多方面的,不仅包括对日本的怠慢(日本事先没有得到相关信息),而且实质上还奖励了提供帮助的巴基斯坦,该国在基辛格秘密访问期间对50万孟加拉人进行大屠杀。基辛格的助手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回忆说:“我们不得不向中国表明,我们是一个可以信赖的打交道的政府”;“我们必须向中国显示,我们尊敬一位共同的朋友。”¹¹再者,当美国人在中国援助下的越南被杀害的时候,这种突然“开放”政策竟然疯疯癫癫地出手了,这绝不是为了威慑苏联不要进攻中国,或者阻止中国进一步干涉越南所必需的,希望通过拥抱中国以使中国减少对河内的支持也是一种幻想。某种性质的中美关系在70年代本来都会出现的,作为尼克松的伟大设计姿态之一而出现应该是不幸的,就好像在那个星期也访问了东亚的澳洲领导人一样。过度兴奋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失望。

尼克松是对杜鲁门和艾奇逊“丢失”中国提出最严厉批评的人之一,他敦促美国政府给麦克阿瑟复职,对中国大陆进行轰炸,现在这位超级的、可能的现实主义者却称赞毛泽东是本世纪的伟人之一。尼克松的出现被一个具有惊人古风的政治和传

385

媒联合体称为天才。与其说詹姆斯·雷斯顿、阿瑟·苏兹贝格和约瑟夫·艾尔索普是新闻工作者,不如说他们仍是局内人和自我审查的业余政客。本来极其反对共产主义的艾尔索普突然对周恩来产生了浓厚热情,他乘坐一架中国军用飞机到云南旅行,他还对热情的专制政权大加颂扬,这些是他在《纽约时报》的两部分系列报告中写下的,也都是在尼克松访华余波中发生的。这表明,对于该时代最有影响力的记者来说,没有什么比影响外交政策更重要了,那就是要了解内幕。网络计算机和DNA排序消息都在观众的视线之外等待刊出,但相比与副国务卿在七楼吃午饭的事情来说,那些又算得了什么呢?

中国热像草原烈火般席卷了得到社会认可的报刊杂志——针灸的奇迹、对赤脚医生的颂扬、对北京已经见过所有世面的那些睿智老人的敬畏,更不用提约翰·加尔布雷思的令人着迷的《中国行》(*A China Passage*)一书了。这种对毛泽东本人的热情膜拜,说明了美国在冷战时期稳步追求任何可持续的政治目标所要经历的困难。恢复邦交被看作是扩大和平的迹象,而忽视了它的主要方面:北京对克里姆林宫的复仇怀有深刻和合理的恐惧——冷战在另一条战线上加剧了。

在国内备受批评的美国领导人在用忌妒的眼光看着那些国家和它们可以依赖的外交激情。从来没有人得到过毛泽东言语清晰的接见,美国总统也不例外。在这个问题上,尼克松不得不等着被毛泽东召见,因为主席生病了。一旦被接受为一个听众,他试图讨好的本领就走得非常之远,以至于他解释说,美国在努力遏制的不仅仅是在亚洲的苏联,而且还有日本,这真令人难以置信。他作了热情洋溢的祝酒辞,而残酷的“文化大革命”正在折磨着中国人民,武器弹药也在源源不断地向南运往河内。

尼克松极度高兴,他要白宫进行宣传,强调他作为“大联盟操作者”的作用,这次交锋被窜改为“两个重量级拳击运动员之间的经典对抗”。¹²就像尼克松和基辛格吹捧的那样,北京的这场竞赛吸

引了1919年对白袜队(White Sox)的全部热情。^①那些喜欢挖苦的人会讽刺说,如果戴高乐是总统,那么毛泽东可能就被安排到白宫吃早餐了。在这次著名的和解之后,人们常常大加褒奖“地缘政治智慧”,这或许是表面最适当的好处之一了。虽然国会还被蒙在鼓里,但北京将开始接收来自美国的有关莫斯科军事力量的高度敏感的情报,作为交换,中国允许美国人使用其领土对苏联的导弹试验进行电子监视。美国收集到了有价值的信息,但是,这些信息并没有显著帮助美国高级官员在随后军备控制谈判中的表现。它们却成了大国关系的关键。

从北京回来三个月后,尼克松又开始了下一次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高峰会议,此前还没有一个在任的美国总统到过克里姆林宫。苏联的寡头政客们得出了与中国人一样的结论:尼克松在1972年选举年渴望他们提供支持。在尼克松飞往莫斯科的前一天晚上,苏联外交部长安德列·葛罗米柯描述了“实际情况”:华盛顿害怕美国会因为“经济和社会后方”的虚弱而在越南遭到失败。¹³美国领导人渴望做交易,而交易也会有的。当然,俄罗斯人出于战术考虑在美苏关系缓和过程中可进可退,他们的机动性又得到了现在流行的秘密渠道的帮助,而这种渠道却把通常更能干的美国代表团和各内阁部门蒙在鼓里。¹⁴

美国的渴望和苏联的雄心在70年代的军备控制谈判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这些谈判著名的有,1972年达成反弹道导弹条约(ABM Treaty)和第一轮战略武器限制会谈(SALT I)中程协议,

^① 1919年,美国面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经济萧条,黑白种族问题一触即发,人民想寄情于棒球,忘掉一切烦恼的需要,比任何时期都来得强烈。没想到,当年的棒球世界锦标赛中竟然传出参赛队伍“芝加哥白袜队”(Chicago White Sox)有比赛放水(fix the game)的事情,很多球迷不敢相信这个消息,如丧考妣,几乎要崩溃。原来,“白袜队”是美国棒球联盟战绩最佳的球队,被球迷们一致看好能拿下世界冠军,但是,球队中有8名队员与赌徒勾结,在比赛中故意输给了“辛辛那提红人队”(Cincinnati Reds)。第二年球季开始时,“白袜队”球员放水的丑闻不胫而走,联邦检察官和大陪审团在调查后判决该8名球员均处终身球监,不得再参加比赛。美国历史将这次作弊假球事件称为“黑袜事件”(Black Sox)。

1974年就削减时限达成协议,1979年签署了没有得到批准的第二轮战略武器限制会谈(SALT II)协议。一眼看去,美国的热情似乎令人钦佩,但仔细去看,就会发现存在无数的幻觉,包括看待苏联的危险方式。要在两个态度高度不一致的力量之间确定某种平衡是困难的,而这种困难只是最小的问题之一。¹⁵

在古巴导弹危机发生后的1年中,迪安·腊斯克告诉参议院说,他倾向于维持对苏联的“很大和全面的核优势”,美国接下去实践的就是那样。但在6年之内,莫斯科的力量实现了大致对等,这迫使尼克松的白宫不得不去谈论“世界的新均势”——仅仅是在SALT I签署后的8个月内,这时均势已经变得更为奇特了,因为苏联第四代重型洲际弹道导弹的飞行试验开始了。在试验两年之后,莫斯科坦率地承认,“苏美关系缓和的目的是要使国际革命的过程尽可能地没有痛苦”。¹⁶

387 战略武器对话曾因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而短暂中断,1969年也已经开始了。尽管柯西金嘲笑过限制反弹道导弹的想法,但那恰恰是1970年莫斯科想要谈判的东西。由于美国的高技术突飞猛进,部署国家导弹防御体系的前景越来越好,莫斯科被迫进入了谈判。令俄罗斯人惊奇的是,美国领导人,不论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都倾向于放弃反弹道导弹,倾向于将这个国家的未来维系在联合自杀的承诺上,因此俄罗斯人接受了战略武器限制对话。当时的白宫几乎不处于谈判的最佳地位,因为人民期待一旦越战结束就可分享“和平红利”,国会也不愿为发展更多的弹道导弹提供资金。¹⁷

美苏代表团之间的第一轮对话是于1971年在赫尔辛基举行的。在整个对话过程中,苏联国防部长主导了苏联方面的谈判日程,并得到了克格勃的支持——克格勃是政治局的全能情报机构和国家内部的秘密警察,克格勃自1967年以来一直处于尤里·安德罗波夫的领导之下。而美国方面,谈判是由特别温和的部门——国务院和军备控制和裁军署(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gency, ACDA)——来处理的,也有来自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基辛格的秘密